

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

程 杰*

【摘要】 我国早期鲜食之瓜是薄皮甜瓜,中古所说寒瓜是冬瓜,唐以前没有任何西瓜种植和食用的迹象,西瓜应是外来物种,因来自西域而得名。西瓜传入我国始于五代,史载天赞三年(924)辽太祖“破回纥得此种”。辽太祖西征不可能远达北疆浮图城,“破回纥”指其进入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漠北回纥故都。我国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干旱缺水,人烟稀少,一直未见有盛产西瓜的记载。漠北回纥鼎盛时奉摩尼为国教,摩尼教崇尚瓜类食物,西瓜应由摩尼传教士从中亚直接带到这里。契丹人由此引入西瓜,在辽上京一带传种,后为南宋与金人引种南下江南、河南、淮南等地,渐成蔓延之势。湖北恩施南宋西瓜碑称雍熙四年(1240)“北游”带来回回瓜,有可能是宋人出使蒙古所为,也应得自回纥故都一带。

【关键词】 西瓜;回纥;辽太祖;新疆;中亚;摩尼教

西瓜是全球重要的水果,也是我国重要的瓜类作物。我国西瓜起源问题备受国人关注,西瓜是本土原产还是外来物种,如属外来植物又是何时引种,近40年许多学者参与讨论,发表了不少可贵的意见。笔者一一搜检研读,发现以黄盛璋先生《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一文用力最深,所见最明^①。但黄先生的考述并非尽善尽美,不仅一些细节较为粗疏,也间有思虑不周、因循失误之处,给这一问题的论证留下了不少有待弥补的空间。黄先生的文章刊发于2005年,此后仍有不同说法出现,也有一些论著着力罗列各类意见,细大不捐,但多述而不论,论而不断,易给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感。笔者有憾于此,特别推举黄盛璋先生所论,并就其言之不详、论述有误和本人另有新见处一并商榷拾补,以期对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有一个比较全面、明确、可靠的认识。

一、我国唐以前没有西瓜种植、食用的迹象

《新五代史》所录五代胡峤《陷北记》,称其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始食西瓜。这是西瓜在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此前各类文献未见任何西瓜信息,因此在我国西瓜起源问题上,所有上溯唐以前的说法都无可靠的文献证据,言之须慎。已有说法必得严加斟酌,谨慎对待。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

①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一) 所谓考古发现的史前、汉代西瓜子已遭否定

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必须首先说明。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杭州水田坂良渚文化遗址、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墓等考古报道称发现有西瓜种子。近30年,经杨鼎新、叶静渊、俞为洁、黄盛璋等学者认真复验和鉴定,这些西瓜子多是冬瓜子,无一可以确认属于西瓜的^①。还有所谓西安西郊唐墓出土唐三彩西瓜,来路既不正,后证明属于伪造。这些考古信息曾被用来证明我国唐以前,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即有西瓜,我国是西瓜的原产地或次生中心之一,如今一一被否弃。显然是考古工作主客观的局限,带来了科学认识上不必要的麻烦,教训值得汲取。

(二) 张蹇使西域引入西瓜说无凭

此说古时罕见,笔者仅于《(康熙)台湾府志》卷四“西瓜”条下一见,今人张仲葛《西瓜小史》^②也持此说,显然都属顾名思义,想其当然,了无根据。

(三) 唐以前文献已有西瓜迹象说均不可靠

主要是受上述考古信息的激发,不少学者竭力寻找相应的早期文献证据。唐以前一些文献资料包括诗赋作品所涉瓜果有迹似西瓜的,唐以后也有一些推溯之言,论者拉杂引用,随意解读,用以证明我国唐以前已有西瓜种植和食用的现象。有关谬说颇多,一并集中辨正。

1. 中古文献所说各类瓜名中无西瓜信息

我国先秦尚无瓜的品种意识,人们多只笼统称之。《诗经》所言只有瓜、瓠两种,瓜中又分瓜、瓠,大者称瓜,小者为瓠。瓠类不论,就瓜的食用价值言,又分两类,一是果用,所谓“七月食瓜”(《诗经·豳风·七月》)即是;另一是蔬用,“疆场有瓜,是剥是菹”(《诗经·小雅·信南山》),说的是腌菹贮存备用。以后世品种相对应,前者是甘瓜(甜瓜)之类,后者当是菜瓜(越瓜)、冬瓜之类,然而在当时都只笼统地称“瓜”。

秦汉迄隋唐通称中古,有关瓜的记述渐多,本草、农书、类书、博物类著作对瓜的品种、用途乃至种植食用、异闻逸事等均有言及。瓜的具体名称逐步出现,《齐民要术》所辑《广雅》《广志》就有龙肝、虎掌、羊骹、兔头、瓠瓠、秋无馀、缣瓜、蜜筒、瓜州大瓜、桂枝等20多种。这些瓜除少量产地明确外,具体性状不明,只能就其名称揣其大概。日本《本草和名》(深江辅仁纂)、《倭名类聚抄》两书的瓜菜类词条多出我国唐人释远年《兼名苑》,从中可见唐人将历代瓜名大致归为冬瓜(又名白瓜)、越瓜、熟瓜(即后世所说香瓜或甜瓜)、胡瓜四类^③。唯虎蹯(一名狸首)、龙蹄(一名青登)特别,专门列出,前者又称“黄斑纹瓜”,后者又称青瓠瓜,以皮色青黑为主要特征,应都不属西瓜,是否即后世哈密瓜之类硬皮甜瓜也未可知。这些瓜类信息中既没有近似西瓜的称呼,也未见有明确可辨的西瓜性状。

2. 中古所说寒瓜是冬瓜而非西瓜

西瓜别名寒瓜,细究其源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方夔《食西瓜》“恨无纤手削驼峰,醉嚼寒瓜一百筒”^④,是首次以寒瓜形容西瓜。李时珍《本草纲目》西瓜集解:“陶弘景注瓜蒂,言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即此也。盖五代之先,瓜种已入浙东,但无西瓜之名,未遍中国尔。”李时珍根据陶弘景所

^①杨鼎新:《杭州水田畝史前“瓜子”的鉴定》,《考古》1987年第3期;叶静渊、俞为洁:《汉墓出土“西瓜子”再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②张仲葛:《西瓜小史》,《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③僧远年著,李增杰、王甫辑注:《兼名苑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1—53页;[日]深江辅仁:《本草和名》,日本宽政八年(1795)江户浅草新寺町(和泉屋庄次郎)刊行本;[日]源顺:《倭名类聚抄》卷一七果瓜部二十六瓜类第二百二十三,书林大坂心齐桥盘顺庆町刊二十卷本。

^④方夔:《富山遗稿》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说寒瓜很大,便认其指西瓜,后来西瓜别名寒瓜之说即出于此。西瓜出现的时间因而被大大提前,今人受其影响,多有此说。笔者近年作花卉植物的文化研究,多有机会接触《本草纲目》,仅就笔者所涉菰菜、茭白、黄瓜、冬瓜等植物,发现《本草纲目》相关内容简单抄掇前人著述、草率定论的现象比较严重。所说永嘉寒瓜是西瓜即属一例,我们不能盲目信从。黄盛璋先生对此略有驳议,但比较简略,笔者不惮辞费,详加论证,或可促进冬瓜、西瓜等相关问题的认识。

寒瓜之名始见于晋。一、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椰树。叶如栝榈,高六七丈,无枝条,其实大如寒瓜。”二、《神异经》:“东南荒中有邪木焉,高三千丈,或十余围,或七八尺。其枝乔直……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长七八寸,径四五寸。”《神异经》传为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学者多表怀疑,但一般认为既不出汉世,也应不晚于西晋,与《南方草木状》大致同时。两条内容均为说明椰树,以寒瓜形容椰子的形状和大小。而《神异经》传本连用两喻,前言“形如寒瓜”,与嵇含所说如出一辙,而其下又紧接“似冬瓜也”,语意明显重复,应非原文所有,而是所谓张华注的内容。《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神异经》即无后一句,晚清陶宪曾《神异经》辑校本也将此句从经文剔出^①。也就是说,“似冬瓜也”一语应是经文“形如寒瓜”的注文,后世误录为经文^②,所谓寒瓜即冬瓜。

此后言及寒瓜者主要有三处:一、沈约《行园诗》:“寒瓜方卧垄,秋菰亦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古人言寒瓜有指秋天尾茬落脚瓜之例,如北齐颜之推《观我生赋》“无寒瓜以疗饥,靡秋萤而照宿”,北宋张耒《海州道中》“逃屋无人草满家,累累秋蔓悬寒瓜”即是,都非瓜名。但沈约此处所写是盛夏初秋园景,所言是瓜名无疑。二、陶弘景《本草集注》注瓜蒂:“永嘉有寒瓜甚大,今每取藏,经年食之。”^③此条即李时珍引据者,今人也多引用作证。永嘉即今浙江温州,在我国东南沿海,这一信息易于引发西瓜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联想。三、唐姚思廉《梁书·孝行传》:“滕县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岁,母杨氏患热,思食寒瓜,土俗所不产,县恭历访不能得,衔悲哀切。”就今日生活经验看,此条所说极易被视作果用的西瓜,但当时究指何瓜,仅凭此句,无从辨认。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条均为南人之事或作品,而前引称寒瓜者西晋嵇含,虽为黄淮之间人,但久居荆州、岭南等南方地区,他们都只称寒瓜,未见言及冬瓜。可资比较的是,同时后魏《齐民要术》对冬瓜的种植、腌制、烹调诸法言之甚详,除引用上述《神异经》椰树文字外,又没有专门提到寒瓜。揣摩其情景,当是魏晋以来,尤其是东晋以来南北分裂,语言上有南北之差,南人所言寒瓜正是北人所说冬瓜,寒即是冬,义同词异而已。前引《神异经》所说椰树之事也当出于南人所言,北人对“形如寒瓜”一语不解,而注者张华是北人,以北人所知作注,进一步透露了南北实同名异的信息。

再就所言形状言,虽然微妙,也值得玩味。众所周知,椰果多略呈长形或梨果形,《神异经》下文即言“长七八寸,径四五寸”。冬瓜有长有圆,以长形为正,沈约诗中称寒瓜“卧垄”也是巧得形似。而西瓜虽亦长圆兼有,却以浑圆为正,传入中土之初,宋人即称“西瓜形如匾蒲而圆”^④。《神异经》以寒瓜形容椰果,所说应以冬瓜更为贴切,而不是西瓜。

上述信息充分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所说寒瓜即冬瓜,稍后唐人的说法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初唐释远年《兼名苑》注称:“寒瓜,至冬方熟者也。”^⑤稍后日人《本草和名》多采辑唐人本草著述而成,著录“寒瓜,色青白、皮厚、肉强”^⑥。“青白”指青皮上有霜粉,“肉强”当指肉质较硬,这些都高度符合冬瓜的特征。

①陶宪曾:《神异经辑校》,《船山学报》1933年第2期。

②《太平广记》辑此事题作《绮缟树实》,与前言《神异经》文本同,见卷四一〇草木五,民国影明嘉靖谈恺刻本。

③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二七,《四部丛刊》影金泰和晦明轩本。

④洪皓:《松漠记闻》卷下,明《顾氏文房小说》本。

⑤僧远年纂,李增杰、王甫辑注:《兼名苑辑注》第52页。

⑥[日]深江辅仁:《本草和名》卷一八。

唐以来,人们多承北人传统通称冬瓜,而寒瓜之名渐废。只有少数著述,由《神异经》而得知“寒瓜,冬瓜也”^①,言者极少,但也远未绝迹。如元华幼武《访志学留别》“寒瓜剖玉迟留客,香橘分金共忆亲”,明顾清《颐浩辩公寄菹菜瓜蒞……》“寒瓜削成蒞,入眼犹自绿”,清沈德潜《寒瓜》“瓜区是处见累累,独有寒瓜种最迟。茅舍秋风常稳卧,槿篱细雨每平垂。断壶聊共烹蒸惯,食肉安知滋味宜。遥想故林萝屋底,依然烂煮晚炊时”,所说都存古意,所谓寒瓜即指冬瓜。尤其是沈德潜“瓜区”“种最迟”“烹蒸”“烂煮”云云,诗末又自注称“荆妇长斋尝植此瓜代饭”,必指冬瓜而非西瓜无疑。

综上所述,寒瓜是冬瓜、西瓜的共有别名,作为冬瓜之别名流行于六朝,而作为西瓜之别名流行于李时珍之后。中古所说寒瓜只是冬瓜而非西瓜,不能认作我国西瓜的历史。

3. 古人诗赋只言片语不宜用作西瓜之证

为了上推我国西瓜的时间,当今论者间亦引用古人诗赋为证^②,方法上属于“以诗证史”。但文学所言多有想象、夸张等“务虚”性质,不能尽信属实,用之须慎。

首先必得说明,两宋以前未见有明确咏及西瓜的文学作品,更不待说以西瓜为题的作品。魏晋南北朝及唐朝出现不少《瓜赋》,常为人们引用的疑似西瓜之言主要有“刘楨赋云‘蓝皮密理,素肌丹瓢’,陆机赋云‘摅文抱绿,披素怀丹’,张载赋云‘玄表丹里,呈素含红’”,引者认为所说“皆非西瓜无以当之”。此三位皆魏晋时人,人们因而怀疑西瓜“不始于五代”,可以上溯六朝^③。孤立地看这些片言只语,似乎与西瓜较为吻合,而放到全文语境中去,理解就不容随便。魏刘楨《瓜赋》:“厥初作苦,终然允甘。应时湫熟,含兰吐芳;蓝皮密理,素肌丹瓢。”所说瓜初生味苦,成熟时转甜而有香味,“素肌”是指瓜肉白色,丹瓢则是瓜肉内壁瓢丝,这些都显系甜瓜的特征。晋陆机《瓜赋》:“或济貌以表内,或惠心而丑颜,或摅文而抱绿,或披素而怀丹,气洪细而俱芬,体修短而必圆”,是铺陈众多瓜的不同形貌,包括羊骹、虎掌、桂枝、蜜筒等奇异品类,有表皮花纹而内里绿色的,也有外皮白色(素)而内里红瓢(丹)的,这都是甜瓜常见的皮肉之色。尤其最后赞其“体犹握虚,离若剖冰”,所谓“握虚”是说腹中空虚,也是甜瓜成熟后的现象,而西瓜无论生熟都是没有明显空腔的。晋张载《瓜赋》:“或玄表丹里,呈素含红,丰肤外伟,绿瓢内醲。”“玄表丹里”常被疑为西瓜,清人吴其濬则认为“甜瓜鲜丹红瓢者”,是仙异之品^④。其实与上例同理,也只是铺陈瓜种繁多奇异,甜瓜的瓜肉无论青白,其内腔瓢丝也多橙红之色,下文又称其“绿瓢”,也就不能视其所赋必是西瓜。笔者认为,如果文辞中没有明确、细致的描写和说明,而不同作品间也没有显示重复出现、明确稳定的西瓜生物特征,只就其中只言片语,取其一鳞半爪之似,视为西瓜的证据,不免有捕风捉影之嫌,方法是极不科学的。

从瓜的品种看,情况又较为复杂。唐以前瓜之品种信息多得之传闻,存名而已,具体性状不明。瓜的分布较广,不同地区、不同生长条件下,瓜的品种变异现象也在所不免,古人报道的奇瓜异瓠应在少数。从这些眼花缭乱的瓜品信息中,要想找到与西瓜一鳞半爪的对应并不难。而仅凭星星点点疑似,草率定论,难以令人取信。

4. 唐以前生食之瓜只是甜瓜

西瓜是生食果用品种,唐以前诗赋中没有任何食用迹象,而反过来,从先秦到隋唐,许多迹象表明,人们生食之瓜应都是薄皮甜瓜,或质量相近的菜瓜(越瓜)之类。我们略举数例可见:(1)食瓜削

① 厉荃:《事物异名录》卷二三蔬谷部上,清乾隆刻本。

② 曾维华:《我国“西瓜”种植起源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连登岗:《我国西瓜种植史探源》,《文史杂志》2002年第4期。

③ 袁栋:《书隐丛说》卷四“西瓜”,清乾隆刻本。

④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三一,清道光山西太原府署刻本。

皮。《礼记·曲礼》有为天子、国君、大夫、庶人削瓜的不同礼仪。《荀子·非相篇》说“皋陶之状，色如削瓜”，唐人注称是面“如削皮之瓜青绿色”^①，“面如削瓜”成了一个流行说法。《北史·王罽传》记载，北魏名将王罽性格质直节俭，“客与罽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罽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食瓜要削去一层薄皮，瓜皮也可食，当然也可不削，这是薄皮甜瓜食用的情景。(2) 甘瓜苦蒂。汉魏古诗有“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②之语，“甘瓜苦蒂”成了人们表达“天下物无全美”的流行俗语^③。这是甜瓜的典型特征，而西瓜蒂是不苦的，也没有嫩苦熟甜的现象。(3) 浮瓜沉李。魏文帝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是举夏日宴游风物，后世“浮瓜沉李”成了描写夏日风物之美的流行用语。薄皮甜瓜成熟后形成空腔，即能浮于水面，而西瓜不能。上述这些中古以前流行的文史掌故，凝结了人们鲜瓜生食悠久而丰富的生活经验，充分表明我国早期生食之瓜是薄皮甜瓜，其中没有丝毫西瓜的影子。考古发现的所谓西瓜种子都被明确推翻，而西汉马王堆汉墓发现大量薄皮甜瓜种子却是广为人知、确凿无疑的事实。2017年3月23日，笔者参观江西博物馆“南昌海昏侯国出土成果展”，所见西汉废帝刘贺遗骸腹部食物残迹中有不少清晰的瓜籽，图片说明称是甜瓜子，这些也都有力证明甜瓜为我国早期果用瓜类的主角地位。

综上所述，将我国西瓜种植和食用的时间上推到唐以前是不可靠的。瓜类作物种植方便，适应性强，传播极为迅速。南宋时，文献明确记载西瓜由东北引入江南，同时也引入金朝的黄河以南地区，短短两个多世纪后的元明之际，已传遍大江南北。设想如果史前、秦汉或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已有西瓜，以我国这样大一统的东亚大国、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以西瓜这样经济价值显著、种植技术简单、传播优势明显的作物，何以六朝、唐代甚至北宋竟都无人言及？西瓜在我国宋以前漫长的历史中除了无踪影，既无其名也未闻其实，使我们不得不坚信，西瓜必定是外来物种，其传入我国现有疆域的时间只能在唐朝以后。

二、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

关于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的文献材料是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所载五代晋人胡峤《陷北记》。欧阳修称：“同州郃阳县令胡峤为翰（引者按：萧翰）掌书记，随入契丹，而翰妻争妒，告翰谋反，翰见杀。峤无所依，居虏中七年，当周广顺三年亡归中国，略能道其所见。”萧翰为契丹后族，契丹灭晋，为宣武军节度使，驻守汴京（今河南开封）。天福十二年（947）闻契丹国主卒，五月退归契丹^④，次年被害^⑤。胡峤本为后晋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县令，契丹征晋时，当为萧翰纳为掌书记，随其北归，后周广顺三年（953）逃返中原。胡峤《陷北记》详细记录了在契丹的经历见闻，其中说到“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⑥。契丹（辽）上京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东镇南，我国西瓜最初是由回纥传到这里。这是史家公认西瓜传入我国最确切的记载，但对由回纥传入的具体时间、来源和途径，迄今有关理解和说法却不尽恰当。问题牵涉较广，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一一辨说。

①荀况：《荀子》卷三，杨倞注，清《抱经堂丛书》本。

②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六五，《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③马总：《意林》卷一，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④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〇，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1页。

⑤脱脱：《辽史》卷一一三“列传第四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九八“晋书二十四”所说稍异，百衲本影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⑥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三，第三册，第906页。

（一）契丹“破回纥”不在中唐在五代

首先有一种说法,把契丹“破回纥”的时间误作漠北回纥汗国灭亡的唐文宗开成五年(840)^①。回纥是我国北方的重要少数民族,本为突厥附属,主要分布于蒙古草原,盛唐以来,与唐交好,联手打击突厥势力,贞观二十年(646)始称可汗,开始称霸蒙古草原。并乘“安史之乱”南下西进,得到迅猛发展,鼎盛时东至兴安岭地区,西至葱岭以西的楚河及伊塞克湖地区,北至南西伯利亚,南至阴山、贺兰山及河西走廊北界^②。唐元和四年(809)改名回鹘。后来天灾人祸频仍,内部政治斗争加剧。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朝中权势勾引北方黠戛斯部族十万大军南下,都城遭焚,可汗被杀,部落民众被迫迁徙。除少量随唐公主南下代、云即今河北、山西北部,主体分三路西迁:一路进入河西走廊,史称甘州回鹘;一路至新疆天山北路,与当地回鹘会合,晚唐五代称雄一时,史称西州回鹘、和州回鹘或高昌回鹘;一路西出葱岭,与当地葛逻禄部落融合,建立黑汗王朝。鼎盛时回纥牙帐或首府在鄂尔浑河上游河畔,地处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通称漠北回纥。漠北回纥汗国被其境北部、今蒙古西北边境一线的黠戛斯军队所灭,时间在中唐,而潢水流域契丹的崛起远在其后,时间在五代。将西瓜传入契丹上京的时间说作漠北回纥亡国之时,是极为简单、低级的错误。

（二）辽太祖西征“破回纥”未及北疆浮图城

通行的认识是据《辽史》太祖本纪所载辽太祖西征之事,认为西瓜是辽兵攻入西域所得。太祖本纪记载:天赞三年(924),辽太祖阿保机“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浮图城本唐庭州驻地,是高昌回鹘汗国的夏都,故址在今新疆昌吉州奇台县西北,由吐鲁番市向北120公里。黄盛璋先生《考信录》即认为:“浮图城即庭州之可汗浮图城,为高昌回鹘之夏都。‘西鄙诸部’指在辽西境外,故皆属于回纥,‘契丹破回纥’就是此次,故瓜种得自拔庭州,而取和州回纥夏都境内诸部,在今新疆东部。”时间更早的漆侠《宋代经济史》:“随着契丹的征尘,西瓜于十世纪初年,就从我国西北边疆传到了我国北部。”^③也应是据《辽史·太祖本纪》认其从高昌回鹘所得。史学界对《辽史》太祖本纪这段话的解读并无异议,得出上述结论也就顺理成章,因而成了西瓜传入我国时间和途径最流行的说法。

但这一说法值得怀疑,问题出在《辽史·太祖本纪》“逾流沙,拔浮图城”所说史实的可靠性上。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太祖本纪所载天赞三年相关西征行迹悉数摘录如下,并随文注明所至具体日期和今人大致认可的对应地名: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

夏五月丙午(阴历5月9日、阳历6月11号),以惕隐迭里为南院夷离董(辽官名),是月从蓟州民实辽州地,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

六月乙酉(6月18日、7月22号),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诏曰……是日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皇子耶律德光)从行。

秋七月辛亥(7月14日、8月17号),曷刺等击素昆那山东部族,破之。

八月乙酉(8月19日、9月20号),至乌孤山(蒙古肯特省西部肯特山),以鹅祭天。甲午(8月28日、9月29号),次古单于国(引者按:指漠北匈奴单于龙城,因属大致方位,故以国称之),登阿里典压得斯山(当是突厥名,龙城附近之山),以鹿祭。

九月丙申朔(九月初1日、10月1号),次古回鹘城(蒙古杭爱山脉东,前杭爱省哈拉和林西北七十里,鄂尔浑河上游西北岸),勒石纪功。庚子(9月5日、10月5号),拜日于蹕林

^①纪世超、于玲玲:《春和苑食话(2)》,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

^②杨圣敏:《回纥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③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6页。

(邱树森《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认为即哈拉和林西百余里之金菊花甸)。丙午(9月11日、10月11号),遣骑攻阻卜(此处疑指杭爱山北之部众),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董迭里略地西南。乙卯(9月20日、10月20号),苏等献俘。丁巳(9月22日、10月22号),凿金河水(陈汉章《辽史索隐》认为即哈拉和林西百余里之金菊花甸附近),取乌山(陈汉章《辽史索隐》认为是杭爱山支脉)石,犖致潢河、木叶山(在今赤峰市翁牛特旗东部,为契丹族祖居地),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癸亥(9月28日、10月28号),大食国来贡。甲子(9月29日、10月29号),诏磬辟遏可汗故碑(一般认为即现存合毗伽可汗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回鹘霸里遣使来贡。

冬十月丙寅(10月1日、10月31号)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10月2日、11月1号),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十一月乙未(11月1日、11月29号)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射虎于乌刺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

四年春正月壬寅,以捷报皇后、皇太子。

史家对这段西征历程有不少解读,对辽太祖由上京出发,西北至蒙古肯特山,转西至鄂尔浑河上游匈奴龙城、回纥故都这段路线和地点均无异见。而天赞三年九月底以下所经胡母思山、业得思山、寓乐山、霸离思山、霸室山等地名,仅见《辽史》,难以考稽,史家异说纷纭。至于西征最远目的地浮图城,史家又高度一致,认为指北疆唐庭州驻地。日人长泽和俊《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①、国人杨富学《论辽朝的西疆经略》^②,都属对辽西向经略之事的专题考论,对此均信守无疑。而笔者认为,辽太祖西征远达北疆浮图城,决不可能。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思考:

一是空间。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曾就辽太祖西征路线提出质疑:“契丹最初立国,限于我国东北、即潢水流域之一隅,天赞三年之役,实远征之始。但由潢水流域西至吐浑、党项,为问若干千里,无论当日所取何道,果能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进乎?《本纪》中所记地名甚多,既多未识何在,乃欲以辽太祖之战功,纳诸额济纳纯沙之地,往返几万里,得无有徒获石田(引者按:指石头做成的田,有名无用)之憾乎?”^③但岑先生意在论证契丹西征之阻卜部落的分布地,认为阻卜不可能西至内蒙古额济纳一线,而对辽太祖的西征终点浮图城并未提出怀疑。我们认为岑先生这段掷地有声的质疑,对太祖本纪所说西征至浮图城更为适用。辽初根基在今大兴安岭南部、潢水流域,其东面的渤海国是其心腹大患,太祖此次西征,是为东征渤海作准备,本意只在拓展西线防役纵深,防止腹背受敌。出征之始的诏书即指明主要任务是“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这些部落当时主要活跃于今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外蒙古南部、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其在新疆境内,也限于东部,辽军没有深入遥远之北疆中心地区的必要。当时高昌回鹘势力正盛,太祖此行对地处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尚无力大动干戈,何以长途抄袭其后,干犯远比甘州回鹘强大的高昌回鹘?就太祖本纪所述,在亲征至回纥汗城后,辽太祖只在近地有数日的攻伐、游猎活动,其帐也应主要驻扎在回纥故城。而“遣骑攻阻卜”,南府宰相等“略地西南”,都属派兵出征,而非本人率军亲征。同样所谓“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也指明是分兵前往,也就不可能数千里孤军长驱深入。而且此段记载中即有两次打猎以充军需的活动,可见辽军到达回纥城后,补给已不充裕,部队不可能再有大规模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有意西进,是否还能西出瀚海,到达今新疆北部地区,很是值得怀疑。

①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4—354页。

② 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0—118页。

③ 岑仲勉:《论阻卜牧地不能在额斯纳》,《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页。

二是时间。史家多只注意考证地名,而对于西征的时间过程并未充分关注,我们分段计算一下。6月18日出发,8月19日至肯特山,直线距离1000公里,用了整整两个月。8月28日至回纥汗城,距肯特山420公里,用了10天时间。此后的整个9月内,太祖的活动以回纥故都为中心,调兵遣将,对北、西、南三面用兵征讨。所谓“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猎寓乐山”,“军于霸离思山”,都只在9月底至10月2日的三四天中,如果都是太祖率兵所为,也应去回纥城不远。

因囿于最终目的地在西域浮图城,史家考释这些山名多称在甘肃西部、新疆东部。如陈汉章《辽史索隐》认为业得思山为珠勒都斯山,寓乐山即南天山,霸离思山即北天山之盐池山。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西州回鹘”部分(第83页)进入新疆后由东向西依次标注地名寓乐山、霸离思山、流沙和北庭(浮图城),显然体现的是《辽史·太祖本纪》太祖西征的地名顺序。日本长泽和俊也认为霸离思山为哈密西北之巴里坤山,即盐池山所在地。而11月初一“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则被视为返程途中在今甘肃张掖(古甘州治所)北之内蒙古阿拉善时的意外收获。

史家沿回纥西出古道对这些地点肆意猜测,但偏偏都忽略了时间因素。从蒙古回纥故都一带到北疆庭州浮图城直线距离1100公里,与前述两段不同,中间因有阿尔泰山山脉横亘阻隔,两点间无法直线行走,实际只能南下阴山,由额济纳一带转西,取道哈密地区向西,等于走了一个直角两边,合计至少应有1600公里。我们所说还都是直线距离,实际行走必多曲折,里程远过于是。如果真像本纪所说,辽军西逾流沙,远达高昌回鹘浮图城,而在11月初又返至阿拉善一带与甘州(驻今甘肃张掖)回鹘北部。何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从今蒙古国西部出发,走完这么长的路程,而又能退返1000公里至今内蒙古阿拉善一线?这段的行军速度与前段从辽上京至蒙古回纥故都相比何以如此神速?这样的高速远征,即便是以现代化的车辆,也非易事。而且额济纳以西多戈壁沙漠,对于辽军来说,远非像蒙古高原那样熟习,行走应更为困难。况且此时又进入严冬,军事行动大受影响,何以行军速度不减反增?这些都令人无法置信。

从上述时、空两方面,仅凭常识就不难感受到太祖本纪所谓“逾流沙,拔浮图城”绝不可能,甚至近乎荒诞。寻思这一错误说法产生的原因,应该归咎于《辽史》编撰的质量。《辽史》成书于元朝后期,编修时间仓促,质量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史所公认。太祖本纪天赞三年冬十月至年底的记载就多有遗漏,太祖此番西征,曾亲抵流沙,而本纪失载。《辽史·耶律斜涅传》:“天赞初,分迭剌部为北、南院,斜涅赤为北院夷离堇。帝西征至流沙,威声大振,诸夷溃散,乃命斜涅赤抚集之。”《辽史·萧韩家奴传》记萧韩家奴奏对:“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这都是说天赞三年太祖西征至流沙,主要针对阻卜、党项等部,此行基本奠定了辽境西部边陲。这样重要的行动,本纪只字未提,可见疏误之甚。

太祖既至流沙,所谓“逾流沙”一语也就并非毫无根据,剩下的就是“流沙”地名的理解。《辽史·地理志》称辽境“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正如清李慎儒所说:“古言流沙者有二,其甘肃安西州之流沙,非辽疆所及。惟《禹贡》弱水余波所入之流沙,即《汉书》所称居延海。”^①《辽史》所说流沙,应即辽境西陲弱水流沙,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辽太祖大军至此,阻卜、党项等少数民族部众闻风惊惧,或降或逃,纷纷前来纳贡,正是本纪所说“尽取西鄙诸部”,也正是完成了出征诏书所说“征叶浑、党项、阻卜等部”的主要任务。本纪所说十一月初一俘获甘州回鹘都督,应即当时曾攻下甘州回鹘某一边城,获其守将。辽太祖在流沙曾派兵西进,但不会深入太远,即或至安西流沙,也只能及其东缘,决不会深入千里翰海,到达北疆浮图城。《辽史》编者

^①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卷一,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或因所据素材有“流沙”一语，以元人“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之空间心理，放大一程，将弱水流沙误作玉门关外之安西流沙、千里瀚海，将进攻甘州回鹘边城误作高昌回鹘浮图城。根据我们上述排比计算，保守地说，《辽史·太祖本纪》中“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数语，如本意无误，至少“拔浮图城”四字应是衍文，或即编修者误书，应予删除。无论辽太祖亲征还是“遣兵”后续行动，都不可能到达数千里之外的北疆浮图城。

（三）契丹由回纥故都获得西瓜

论定这一点，再来看契丹西瓜的来源，所谓辽太祖西征至高昌回鹘浮图城获得西瓜的说法就失去依据。胡峤所谓“契丹破回纥得此种”，是转述契丹人的介绍，所谓“破回纥”只能是指辽太祖进入漠北回纥故都。当时在此诏令刻石纪功，也可见辽太祖的重视。从时间上说，这在九月初一，辽大军在此至少待到月底，这应正是蒙古草原西瓜成熟的季节，有机会接触到当地的西瓜。而十月以后进一步西征，渐行渐冷，如若真能越千里瀚海，西抵北疆浮图城，也当是天寒地冻之时，难以见到西瓜^①。而以游牧民族，数千里长途奔袭后，也不可能有心掳掠屑小瓜种带回。因此我们说，所谓“契丹破回纥得此种”，必是天赞三年（924）九月进入漠北回纥故都时所得，这应该是可以确认的。

（四）亚洲西瓜发源于中亚花拉子模、撒马尔罕等地

接着而来的问题是，蒙古草原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生活区，回纥（回鹘）故都一带种植西瓜是否可能，瓜种又是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黄盛璋先生文中勾勒的此间西瓜在亚洲传播的信息，来寻找合理的解释。

黄先生称，“现我考明，中亚西瓜最早为花拉子模人种于八、九世纪”，西瓜的波斯语、中亚波斯语、突厥语、维吾尔语“必有一个共源，应即花拉子模语。新疆不是自波斯，而是自中亚引种，今伊朗有些地方，甚至自中亚传去”。研究表明，西瓜原产于非洲，埃及、中东等地首先引种，然后分南北两路向亚洲大陆传播。花拉子模位于中亚“母亲河”阿姆河下游三角洲、咸海南岸，是中亚文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中亚粟特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骨干，粟特与花拉子模同处阿姆河流域。黄先生的意见是，正是丝绸之路创通后，擅事国际贸易的粟特人或者就是花拉子模商人将西瓜从埃及或西亚带到了今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和粟特人集中分布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地区。黄先生的主要依据是《阿拉伯通史》关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期布哈拉地区园艺繁盛的一段记载，其中提到花拉子模的西瓜是极其著名的，曾用铅模裹上冰雪封装贡奉阿拔斯帝国首都巴格达哈里发（穆斯林最高首领）^②，时间在公元九世纪的前期。虽然所举只是孤证，但据我们检索，大约公元1220年，元人耶律楚材在西域粟特人聚居地所见“八普城（引者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西瓜大者五十斤”^③，西辽河中府（治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古称寻思干）一带“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满筐”^④。公元1332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前往印度途中，经过花拉子模，也盛赞“花刺子模的西瓜是世界上从东到西独一无二的”，可以媲美的只有粟特人聚居的布哈拉以及伊斯法罕（在今伊朗中部）^⑤。这些前后几个世纪异口同声的赞扬，充分说明花拉子模与宰利水流域（即西辽河中府）今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作为中亚乃至整个亚洲西瓜名产地和发祥地的特殊地位。

^①耶律楚材《再用韵纪西游事》：“河中（西城寻思干城，西辽目为河中府）花木蔽春山，烂赏东风纵宝鞍。留得晚瓜过腊半，藏来秋果到春残。”《湛然居士集》卷四，《四部丛刊》影元钞本。所说应指甜瓜，西瓜是较难贮存的。

^②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11页。

^③耶律楚材撰，李文田注：《西游录注》，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④耶律楚材：《赠高善长一百韵》，《湛然居士集》卷一二。

^⑤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6页。

（五）西瓜首传我国新疆的说法并不可靠

史家记载花拉子模西瓜盛产的最早时间,相当于我国中唐时期,实际兴盛的时间应该更早些,与阿拔斯王朝的鼎盛时期大致相当。黄盛璋先生进一步说明的是,我国北疆浮图城的西瓜应是晚唐五代以前由此传来。这样从花拉子模到我国北疆浮图城,再到我国东北辽上京,三个纬度基本相同的地方,在九世纪早期到辽太祖西征的十世纪早期一个世纪内,完成了西瓜的接力东传,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过程。如今但凡认同西瓜于五代传入我国者,都毫不犹豫地坚信这一点。但是我们上文的论证斩断了这一合理的线索,宣告北疆浮图城作为中转站的证据无效。

笔者进一步发现,包括黄盛璋先生在内,许多关于当时新疆地区盛产西瓜的论说都是值得怀疑的。人们最常提到的是十一世纪后期我国维吾尔族学者摩赫穆德·喀什葛里的《突厥语大词典》,黄先生即称其中有“阿吾兹”一词(应是维吾尔语西瓜一词),并称当时喀喇汗王朝(也称黑汗王朝或葱岭西回鹘汗国)东部,包括其东都喀什汗(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一带“境内广泛种西瓜”。黄先生的这段论述,并未明确具体文献依据,似乎是从《突厥语大词典》获得的信息。然笔者就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汉译三卷本《突厥语大词典》反复逐句检索,未见有“西瓜”的专门词条。与瓜有关的词汇多属甜瓜,有专门的甜瓜词条^①,有大量与吃甜瓜有关的例词、例句^②,也有黄瓜的专门词条^③和相关的例词、例句。而西瓜只见于一处释文:“驮篓,驮筐。驮运甜瓜、西瓜、黄瓜等物的篓子。”^④而另一处词义、写法、读音相近的词条释义则写作“驮筐,装运甜瓜、黄瓜等的驮筐”^⑤,没有提到西瓜。两者有可能属于突厥语的方言差别,反映西瓜在中亚广阔的突厥语区并不是到处都有,从《突厥语大词典》中无法得出喀喇汗王朝东部地区(包括今新疆喀什地区)“广泛种西瓜”的结论。

进一步追寻所谓《突厥语大词典》西瓜种植信息的来源,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丝绸之路漫记》一书中的《新疆西瓜种种》一文^⑥有可能是始作俑者。该文称:“西瓜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新疆,由新疆又传入我国内地。据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的出土文物中,便有一千年前的西瓜种籽。著名的《突厥语大辞典》中提到,公元十世纪时,‘新疆南部及中亚地区已经广泛种植‘阿吾兹’。”这里还把“新疆南部”云云加了引号,显然不可能是《突厥语大词典》的原文,不知所据何典。后来许多有关新疆西瓜的论述多转述这段引文,未见有人追究其文献出处。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段引文中还提到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文物中有西瓜籽一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大型墓葬群,时间多属初盛唐时期,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如果真像该文所说,则是新疆地区唐时已有西瓜种植的有力证据。但笔者翻遍1981年以前所有阿斯塔那考古发掘报告^⑦,并进而查阅了后续发表的同类报告,只见有葡萄、枣、梨的内容,未见有西瓜籽的报道。又检《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卫期先生《西域农业考古资料索引(续)》所举新疆等地出土实物和图文中的农作物部分,只有葫芦、甜瓜子,而没有西瓜种子及其信息。新疆境内各类唐五代出土文物如吐鲁番文书中的瓜类信息都是甜瓜,所说应是哈密瓜之类硬皮甜瓜,而不是西瓜。同时有维吾尔学者著文明确指出,截至2005年,新疆出土文物中并未发现西瓜的种子^⑧。不知《新疆西瓜种种》所

①摩赫穆德·喀什葛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

②仅《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就有第16、95、188、231、289、290、301、416、426、432、513、525、529、530页出现甜瓜。

③④《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第483、426页。

⑤《突厥语大词典》第3卷,第215页。

⑥成一、赵昌春、梁鸣达、李现国、申尊敬、李犁:《丝绸之路漫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276—279页。

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⑧伊斯拉菲尔·王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从考古发现看古代新疆园艺业》,《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

说究属何据,再细看其措辞,前面有“据说”二字,不免令人疑窦顿生。但就是这样一种无根之谈,被后来许多论著抄录、转述甚至引用^①,大有三人成虎之势,假的似乎说成真的了。可贵的是黄盛璋先生没有引用这一说法,但文中“《突厥语文辞典》名‘阿吾兹’”、“东哈刺汗朝,境内广泛种西瓜”云云,也隐有《新疆西瓜种种》这段信口开河的影子,令人不免遗憾。

新疆地区出现西瓜的明确记载是元蒙人《长春真人西游记》。1222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召见来到西域,重阳日路经昌八刺(今新疆昌吉市),当地回鹘王夫妇招待他,“劝蒲萄酒,且献西瓜”^②,这说明最迟在十三世纪早期,西瓜已经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但此后的元明清时期,新疆境内的西瓜一直乏善可陈。不仅是新疆,乃至西北甘肃、青海、宁夏诸省区,并未有盛产西瓜的任何记载。今所见明清和民国时这些省区的方志中,有瓜种从内地引入的记载^③,而没有反过来由新疆向东传播的迹象。以甘肃省为例,其西瓜的分布以东南部紧邻陕西省的天水市、陇南市一带较盛,而愈向西北,产地愈稀,甚至有“陇以西无西瓜”的说法^④。揣度其情理,应是西瓜并不像哈密瓜之类硬皮甜瓜耐旱,生长中需要土壤水分较多,而我国新疆包括东西相邻的广大地区唐以来干旱现象已比较严重。加之西瓜是鲜食水果,水份含量大,不耐贮存和运输,大面积种植需要相对集中的消费人群,而西域地广人稀,沙漠绿洲经济规模不够稳定,聚居规模小,都市集镇少,消费人群分散,销售不畅,很难大面积种植和持续发展,也就很难出现大规模的西瓜产地。

根据上述这些情景,在没有明确的文献和考古依据的情况下,所谓唐五代我国新疆地区已经盛产西瓜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元明清时期,新疆、甘肃一带的西瓜产地稀少,未见任何有关的盛产地、名产地,由此也不难推见,我国西瓜最初由中亚传入新疆,在新疆绿洲扎根传种,再经过长期蔓延、扩展而逐渐传入内地,这一最合乎想象的过程也几乎没有可能,至少于史无征。

(六) 西瓜当由摩尼传教士从中亚带至漠北回纥

而越过新疆,西瓜从中亚直接东传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古回鹘城一带,应该是一种很特殊的情景,需要异常的机缘和方式。我们认为最合理的可能应该是中亚摩尼传教士直接将西瓜种子从中亚带到漠北回纥牙帐所在的鄂尔浑河流域,在那里生根传种。

摩尼教,因其崇尚日月光明,又称明教,为三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盛行于中东、中亚地区,大约公元六至七世纪进入东亚。唐武后延载元年(694),波斯拂多诞将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国。最初在唐传播并不顺利,开元二十年(732)朝廷曾明令禁断。但对于唐天宝四年(745)正式号称汗国,对外积极进取,扩大贸易交流,对内谋求民族整合,强化政权建设的蒙古高原回纥统治者来说却是如获至宝。唐“安史之乱”时,回纥汗王领兵南下助唐,渡河至东都洛阳,杀史朝义,在这里接触到摩尼传教士。次年即广德元年(763),从洛阳带回四位摩尼僧,经过内部短暂的思想斗争后,尊摩尼为国教。“回鹘常与摩尼议政”^⑤,摩尼传教士积极参与汗国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对唐的外交事务,社会地位举足轻重,并凭借唐王朝对回纥的倚重,扩大其影响。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以来,唐敕许回纥之请,在长安、江淮等

^①新疆人民出版社编:《新疆风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赵维臣主编:《中国土特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9页;雪梨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5页;王潮生:《农业文明寻迹》,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第41页;冯晓华主编:《新疆旅游资源》,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

^②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明正统《道藏》本。

^③高增贵:《(民国)临泽县志》卷一物产:“甘瓜”条下称“种自哈密来,故名哈密瓜”,而“西瓜”条下称“今所传同州种也”,同州,治今陕西渭南市大荔县。民国三十二年刊本。

^④胡缙宗:《(嘉靖)秦安志》田赋志第七“多甜瓜,多西瓜”后注:“陇以西无西瓜,惟县川有西瓜,出县川虽种亦不结。”明嘉靖十四年刊本。县川是县内的主要河流,沿岸产瓜。陇是陕、甘两省交界的陇山,“陇以西”是指整个甘肃。

^⑤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明《津逮秘书》本。

地建立摩尼寺,摩尼教积极向内地渗透和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摩尼教在漠北回纥汗国奉为国教的近80年,是摩尼教传入东亚以来最受宠遇、最为兴盛的时期。而此时的漠北回纥,与唐朝密切合作,全面统治蒙古草原,并积极向西域发展,基本控制了天山北路,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在其势力范围内,从中亚到蒙古高原的草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在吐蕃势力阻塞河西走廊后成了西域通向唐朝内地的主要通道,摩尼教在此线极其盛行。这都是回纥汗国和摩尼教广为人知的辉煌历史。

摩尼教主张素食,有崇尚瓜类食物的习惯,据我国摩尼教研究者介绍,“摩尼规定他的信徒要崇拜日月……规定他们不杀生,不食肉,只能吃含光明分子较多的菜蔬,以增加自身的光明成分。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摩尼教徒把瓜类的种子当作光明分子,以吞吃瓜子为乐事”^①。“瓜当中的光明分子特别多,因此瓜是他们的食物。”^②外国学者也指出,摩尼教徒主张“吃蔬菜和面包”,“特别是西瓜和黄瓜,认为光明分子集中在这些瓜当中”^③。西瓜是当时中亚地区新兴的瓜果品种,是摩尼教所谓光明分子的时尚载体,应该受到摩尼传教士的特别重视,而盛产西瓜的花拉子模、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又正是摩尼教在波斯本土受到迫害后的主要根据地^④,是当时摩尼教会中亚教团所在地^⑤。这种地缘上的巧合,使中亚新兴的西瓜与摩尼教信仰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恰巧此时漠北回纥汗国尊摩尼为国教,无疑是西瓜东传蒙古高原的天赐良机。上述摩尼教饮食方面的严格要求对回纥这样以牛羊肉、乳为主食的游牧、狩猎民族来说,无疑极难遵守。不难想象,为了报答回纥汗王的宠遇,吸引更多的游牧信徒,摩尼教团定会卖力地将中亚地区盛产的西瓜引送回纥核心地区。据元和九年《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记载,当时“慕闾(引者按:摩尼五级僧侣中地位最高的一级)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唐李肇《国史补》也说“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⑥。正是这些大小教职人员,还有大量信奉摩尼教的粟特商人在中亚摩尼教根据地与蒙古草原之间的频繁往来,给西瓜的东传提供了最为密集、切实、可靠的机会。

仅有教团传播的积极性还不够,还得有接受地的地利人和。史家已注意到,漠北回纥核心地区原就有一定的农业基础,色楞格、鄂尔浑两大河谷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农耕占有相当的比例^⑦。据九世纪初叶阿拉伯旅行家的描述,鄂尔浑河上游的回纥都城一带农耕生产、城乡社区的规模已十分可观,都城建筑气势雄伟,城内房屋多,人口稠密,工商业云集,城外乡村环绕,耕地连片^⑧。这样的情景与中亚花拉子模和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商贸都市所在的阿姆、锡尔两河间河谷沃地十分接近,纬度也不过高,正是西瓜这类不耐干旱、不耐贮运之鲜食水果得以种植传播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活土壤。只有在这样水土肥美、人口聚居、农耕比较发达的城乡社会条件下,西瓜才能真正生根传种。

我们认为正是上述外来传入与本土接受的巧合对应,使西瓜直接从中亚传到蒙古草原并能持续种植成为可能,而时间应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摩尼教正式引入漠北回纥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黠戛斯汗国军队攻灭回鹘都城的70多年间。从漠北回纥灭亡、回纥部众大举西迁到辽太祖西征至此的924年尚有80多年,漠北草原似乎是一个权力真空时期,黠戛斯胜而不居,没有在此驻留的任何迹象,也没有其他民族势力统治的任何记载^⑨。天赞三年(924)辽太祖大军至此面对的主

①林悟殊:《古代摩尼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0页。

②马小鹤、张忠达:《光明使者:图说摩尼教》,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3年,第74—75页。

③[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352—353页。

④[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⑤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1—62页。

⑥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⑦杨圣敏:《回纥史》,第73页。

⑧胡铁球:《回纥(回鹘)西迁之前的农业发展状况略论》,《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⑨[美]Michael R. Drompp(张国平):《打破鄂尔浑河传统:论公元840年以后黠戛斯对叶尼塞河流域的坚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要仍只是回纥遗民,当然还应包括原漠北回纥统治下的粟特、汉族等定居务农民众。从辽太祖当时遣使对甘州回鹘王所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①,后来辽在此设回鹘国单于府加以管理^②都不难看出,回纥大举西迁后这一带基本保留了漠北回纥原有的人居状况。正是这些原回纥统治下农业化而安土重迁的民众,将西瓜一直种到了80多年后契丹人的来临。

黄盛璋先生论证西瓜由新疆传入辽上京,还举新疆高昌回鹘故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哈喇和卓)发现的摩尼寺彩绘祭供图为证。该图所绘当为摩尼教庇麻节祭供场景,图中金盘瓜果底层为甜瓜,中层为葡萄,最上为一颗翠色墨纹圆瓜,一般都认为是西瓜^③,笔者反复审视此图,也深表认同。高昌回鹘是漠北回鹘亡国西迁中数量最大的一支,与天山北路原有回纥部落融合而创立新汗国,都城在高昌,北庭浮图城为陪都。德国人发现的这幅祭供图有力证明了我们上文所说西瓜在摩尼教徒心目中的地位,但就图中所绘“选民”着白色法衣,多标波斯人名,很难说这是高昌当地庇麻节的真实写照,而更像一幅摩尼教的通用宣传画,描绘的可能是摩尼教会活动的经典场景。即便该图所绘确属高昌回鹘当地的节日情景,表明高昌此时已有西瓜,时间也必在漠北回纥亡国之后,而且这里的西瓜种子也有可能是在回纥大举西迁时由漠北故都带来。而此时阿拉善高原即居延流沙一线已为党项、吐浑、阻卜等部所据,漠北与西域间往来并不畅通,如果是高昌回鹘新由中亚传入西瓜,也很难由此再东传漠北。因此我们认为,契丹人在漠北回纥故都遇到的西瓜不会是后来高昌回鹘等西域地方传入,而应是漠北回纥鼎盛时由中亚摩尼传教士直接传来。

当然,从中亚到漠北的路一般都会经过新疆,也就是说西瓜在传入漠北前应该行经新疆一线,因此无法完全排除西瓜同时传入新疆地区的可能性,而且高昌回鹘故城的摩尼庇麻节祭供图也不失为新疆境内九世纪后半叶至十世纪已有西瓜的一个有力证据。但除此之外,直到十三世纪之前新疆及附近地区没有出现西瓜的其他迹象,这至少表明整个唐五代,也就是西瓜在漠北回纥故都与辽上京西瓜接力传播的同时,在新疆一带并未真正落地传种、得到发展,因而也就没有任何直接的后续信息。契丹人获得西瓜的地方,应是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回纥故都一线,而不是新疆浮图城、高昌城等西域地方。

胡峤《陷北记》所说“以牛粪覆棚而种”的种法也耐人寻味。覆棚应是保温措施,中亚花拉子模、布哈拉、撒马尔罕等西瓜盛产地与我国新疆高昌城、浮图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同在北纬40°附近,都属北纬45°以南,在正常气温条件下,夏秋种植西瓜不需要特殊的保温措施。而漠北回纥故都在北纬45°以北,气温偏低,无霜期相对短一些,这里种植西瓜其保温措施就显得特别重要。契丹(辽)人的种瓜技术是新从漠北传来,到胡峤“陷北”时才过去短短20多年,尚存回纥故都种植旧法。试想如果在“中亚-新疆-东北”同一纬度上东西传种,气温相当,一般情况下,就不需这种保温措施。

综观上述各方面的信息,可以肯定地说,我国西瓜是从漠北回纥故都今蒙古前杭爱省哈尔和林一带引入,而这里的西瓜应该是公元763—840年回纥汗国奉摩尼为国教时由摩尼传教士从中亚花拉子模、撒马尔罕等西瓜盛产地直接传入。正如王祯《农书》所说,西瓜“种出西域,故名西瓜”^④,而所谓“西域”应是作为摩尼教根据地和西瓜盛产地的中亚核心地区。胡峤《陷北记》最早使用西瓜这一名称,并未作任何说明,显然是辽上京当时习语。或者漠北回纥时早已有此汉语定名,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至此,将西瓜种子、种植技术连同名称一并带到辽上京。

①脱脱:《辽史》卷三〇《天祚本纪》,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②脱脱:《辽史》卷四六“百官志·北面属国官”。

③这幅彩图可见马小鹤《光明有使者——摩尼与摩尼教》彩图第26页图5—17,详细的文字介绍可见该书第262—26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王祯:《农书》卷二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七) 恩施西瓜碑所说“回回瓜”或也从蒙古高原传入

西瓜转入辽上京后在当地传种^①，南宋初传入两淮、江南，同时也在金朝内南下河南，对此黄盛璋先生等论之已详，此处不赘。湖北恩施宋末西瓜碑还提到一种“回回瓜”^②，也是从域外传来。黄盛璋先生认为所谓“回回”指“和州回鹘”或“高昌回鹘”。笔者认为“回回”之称虽源于回鹘，但不能简单等同回鹘，南宋人所言也远非回鹘。实际所指较为宽泛，正如有学者论证，南宋人所言回回一般指西域伊斯兰化之各族，是各族穆斯林的通称^③，而以中亚核心地区伊斯兰教盛行的国家为主，应该是比高昌回鹘更西地区。

恩施西瓜碑原文称“又一种回回瓜，其身长大，自庚子嘉熙北游带过种来”。是说恩施当时所种有四个品种，“三种在淮南种食八十余年”，而所谓回回瓜，特别指明是理宗嘉熙四年（1240）北游带来。时间说得如此明确，非同寻常。嘉熙四年去西瓜碑所署度宗咸淳六年（1270）过去整整30年，一般情况下所说应非碑文作者本人或碑主郡守秦将军的经历，而应是发生在嘉熙四年而广为公众所知之事。宋理宗绍定（1228—1233）、端平（1234—1236）间蒙古取道四川南下，南宋失地辱国，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不得已与元蒙数度使臣往还协商，顺从其意，联合攻金。端平元年（1234）金亡，南宋唇亡齿寒，直接面对蒙古大军的压力，江淮间从此再无宁日。嘉熙四年，蒙古使者王楫前来议索岁币，这是宋蒙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王楫五月卒于宋，谈判中止，和议未成，南宋遣使护送其灵柩归蒙古^④。当时金朝新亡，元蒙大军压境，江淮间形势紧张，战事频仍，南宋人无端北游不可思议，宋人也几无向西穿越西夏、吐蕃等势力范围往来西域的可能。度其情势，所谓“嘉熙北游”当是隐指宋、蒙两国交聘即该年宋使护枢使北之事。西瓜碑刻立之咸淳年间，南宋亡国在即，元蒙已成当头仇敌，宋人言之沉痛，将“使北”之事说作“北游”。或者碑文所记本较详明，而实地锥形山岩摩面刻字有限，不得已因陋就简，压缩文字，只缀其要，以“北游”二字概称。这两种情景都不难想象，可能性也都较大。

从稍早嘉熙元年（1237）完成的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可见，当时蒙古西线与“回回国”战事频繁，最远处征战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线^⑤，即上文反复言及的西瓜盛产地，以瓜大著称。西瓜碑所说“北游”带回的“回回瓜”，“其身长大”，特征显明，与南宋初年洪皓由辽上京故地引入，以及金人传种至河南、淮南等地的品系明显不同，应属更靠近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布哈拉、撒马尔罕等西瓜名产地的品种，想必是成吉思汗大举西征时由中亚带至蒙古首府窝鲁朵城即漠北回纥故都一线，这里已有西瓜种植的传统在先。明初叶子奇《草木子》称“元世祖征西域，中国始有种”^⑥，又有称元太祖西征所得的^⑦，所说史实未必确切，但都多少反映了此间西瓜又一轮大举东传的机会和迹象。因此笔者认为，恩施西瓜碑所谓“嘉熙北游带过种来”的回回瓜，应是由蒙古大军西征回回国，引入蒙古草

①关于西瓜在辽境的传播，并无明确的文字记载，有两处考古发现。一是内蒙古敖汉旗羊山1号、下湾子5号辽墓宴饮壁画绘有西瓜，与桃、石榴一起装于盘中，见《内蒙古文物》1990年第1期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1998年第1期王大方《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兼论契丹引种西瓜及我国出土古代西瓜籽等问题》。二是北京门头沟斋堂镇辽墓壁画侍女图，侍女托盘内“盛石榴、鲜桃、西瓜”，见北京市文物管理局、门头沟区文化办公室发掘小组《北京斋堂辽墓壁画发掘报告》，《文物》1980年第7期。敖汉旗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今同属赤峰市，诸墓时间都在辽中晚期，说明此时辽上京周围依然盛产西瓜。门头沟斋堂镇的辽墓属辽晚期，从发表的侍女图看，盘内石榴、鲜桃都清晰可辨，却未见明显的完整西瓜形状，似是切成的瓜片样，有待进一步辨认，很难认定此时西瓜已传入北京地区。

②恩施宋末西瓜碑文详见刘清华《湖北恩施“西瓜碑”碑文考》，《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湖北恩施“西瓜碑”碑文注释》，《碑文考古》2008年第1期。该碑文至今尚有一字误识，右起第8行第8字应是“今”，全句应作“种亦遍及乡村。今刻石于此，不可不知也”。“今”，民国郑永禧《施州考古录》作“谷”从上，刘清华作“无”从下，均误。

③杨军：《“回回”名源辨》，《回族研究》2005年第1期。

④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二：“庚子嘉熙四年……北使王楫来，先是楫请北朝与本国和好，嵩之遣使至草地，与楫偕来议岁币，彭大雅使北。”元皇庆元年陈氏余庆堂刻本。

⑤许金胜：《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

⑥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⑦陆深《豫东抄》引《草木子》作元太祖，佚名《树艺篇》果部卷八，明纯白斋钞本。

原腹地,再由南宋使臣或其他随行人员带入宋境,在江淮间传种的新品种。

综合全文所论,我国早期生食之瓜是薄皮甜瓜,中古所说寒瓜是冬瓜,唐以前没有任何西瓜种植和食用的迹象。我国西瓜应是外来物种,因来自西域而得名。西瓜传入我国始于五代,史载天赞三年(924)辽太祖“破回纥得此种”。辽太祖西征不可能远达北疆浮图城,“破回纥”指其进入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漠北回纥故都。我国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干旱缺水,人居稀少,一直未有持续传种、盛产西瓜的记载。漠北回纥鼎盛时尊奉摩尼为国教,摩尼教崇尚瓜类食物,西瓜应由摩尼传教士从中亚今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撒马尔罕、布哈拉等西瓜盛产地带到这里,时间在公元763—840年间。契丹人由漠北回纥故都获得西瓜,在辽上京一带传种,后为南宋与金人引种南下江南、河南、淮南等地。湖北恩施的南宋西瓜碑称嘉熙四年(1240)“北游”带来回回瓜,有可能是南宋人出使蒙古所为,也应得自回纥故都一带。也就是说,传入我国的西瓜是由中亚盛产地,经过草原丝绸之路东传,首先落脚蒙古草原的鄂尔河上游农耕区,以此为中转,于五代和宋元之交陆续传入我国东北和南方的。

(责任编辑:高峰)

Introduction of Watermelon into China: Its Time, Origin and Route

CHENG Jie

Abstract: The melon eaten raw in ancient China was pellicle melon. The so-called *hangua* 寒瓜 (literally cold melon) in the medieval times was actually the white gourd.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cultivation or consumption of watermelon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so the watermelon must be a kind of exotic species. The introduction of watermelon into China began in the Five Dynastie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third year of Tianzan (924 AD), Emperor Taizu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Liao Dynasty “conquered Huihe and got watermelon seeds”. His western expedition wasn’t likely to be going as far as the Buddha City of northern Xinjiang. “Conquered Huihe” means entering the former capital of Huihe in the upstream of the Orhon Gol in Mongolia. China’s Xinjiang and even the whole Northwest was arid, short of water resource and sparsely populated. Hardly have any records of abundant watermelons been found. In its heydays, the Uighur Nation (Huihe) of Mobei worshiped Manicheism, which advocated food like melons. Watermelons must have been directly brought here by Manichean missionaries from Central Asia and consequently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Khitan people, and spread in the Upper Capital of the Liao Dynasty. It was later introduced by the people of Southern Song and Nüzhen into the southern areas including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Henan, and Huainan. It was then gradually spread to many other regions.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tele of watermelo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ocated in Enshi, Hubei Province, says that in the fourth year of Emperor Yongxi (1240 AD),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has brought back some “huihui (Muslim nation) melon”, which might refer to the Song people’s visiting to Mongolia. Perhaps this melon also came from the capital of Huihe.

Key words: watermelon; Huihe; Emperor Taizu of the Liao; Xinjiang; Central Asia; Manicheism